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

霧月十八日



02.3  
445-44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

雾月十八日

人 民 出 版 社

• 一九六二年 • 北京

KARL MARX  
DER ACHTZEHNTE  
BRUMAIRE DES LOUIS BONAPARTE

本书正文及书末注释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中的译文排印的，前面两篇序言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第1卷中的译文排印的。

馬 克 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旧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4 · 字数 87,000

1962年8月第1版

196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1,300 定价（五）0.40元

统一书号 1001·542

## 卡·馬克思为本书 第二版作的序言

我的不幸早逝的朋友魏德迈<sup>①</sup>，曾打算从1852年1月1日起在紐約出版一个政治周刊。他曾請求我给这个杂志写一篇政变史。根据这个請求，我一直到2月中旬止，每周都为他撰写論文，总标题是“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时，魏德迈原来的計划遭受了失敗。但他在1852年春季已开始出版命名为“革命”杂志的月刊了，月刊第1期的內容就是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篇著作有数百份那时已深入德国境内，不过沒有在真正的书籍市場上出售过。当我向一个自命极端急进的德国书商建議銷售我这本书的时候，他的答复是对这种“不合时宜的企图”表示真正道义的惊愕。

从上述事实中就可看出，本书是根据对于事件的直接观感写成的，其中所研究的历史材料只是截至1852年2月止。現在把它再版发行，一方面是由于书籍市場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由于我那些在德国的友人們的坚持。

在与我这部著作差不多同时出現并且是专論同一問題的著作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两部：雨果著的“小拿破侖”和蒲魯东著的

<sup>①</sup> 魏德迈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担任过圣路易区軍事长官职务。（这是馬克思加的附注）

“政变”。

雨果只是对政变事件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辛辣的和谈谐的詈罵。事变本身在他笔下却竟繪成了晴天的霹靂。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說这个人表现过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輕蔑而是抬举了这个个人哩。蒲魯东呢，他想要把政变描述成为先前历史发展的結果；但是，他对于这个政变所作的历史的說明，却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于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的辯护了。这样，他就陷入了我們那班所謂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錯誤。反之，我所作的論述是說明法国階級斗争怎样創造了一些条件和情势，使得一个平凡而可笑的人物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这本书如果加以修改，就会失去其特有的色彩。因此，我只是改正了一些刊誤，并且删掉了一些現在已經看不懂的暗喻。

我这部著作的結語——“但是，如果皇袍終於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侖的銅像就将从汪东圓柱頂上被推下来”——这句话已經實現了。

沙尔腊斯上校在他論 1815 年远征的著作中 开始了反对崇拜拿破侖偶像的攻击。从那时起，特别是在最近几年中，法国的出版物用进行历史研究、批評、諷刺和談谐作为武器彻底打破了关于拿破侖的奇談。在法国境外，这个一反傳統民众信仰的激烈轉变，这个巨大的精神革命，很少使人注意，更不大为人所理解。

最后，我希望，我这个著作对于扫除那种流行的——現今特別在德国流行的——关于所謂愷撒主义的童蒙詞句，将会有所帮助。在作这种肤淺的历史的比拟时，人們忘記了主要的一点，即在古代的羅馬，階級斗争只是在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內部进行过，只是

在自由富人与自由穷人之間进行过，而从事生产的广大民众，即奴隶，則不过是战斗者的消极台柱。人們忘記了西斯蒙第所說的一句中肯的評語：羅馬的无产階級依靠社会过活，而现代社会則依靠无产階級过活。由于古代階級斗争与现代階級斗争在物质經濟条件方面有这样的根本区别，所以由这种斗争所产生的政治人物之間，也就不能有比坎特伯雷大主教与祭司长撒姆依尔之間所有的更多的共同点。

卡尔·馬克思

1869年6月23日，倫敦

卡·馬克思专为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1869年在汉堡出版的第二版而作

按第二版本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 弗·恩格斯为本书 第三版作的序言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在初版問世三十三年后还有印行新版之必要，就是证明这部著作至今还没丝毫失去自己的价值。

的确，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在一个事变——这个事变像晴天霹靂般震惊了整个政治界，这个事变在一些人中間受到了道义忿怒的高声叫罵，在另一些人中間被看作是从革命中解救出来的出路和对于革命誤入歧途的惩罚，但是这个事变在所有一切人們中間都是只引起过惊異，而却没有被任何人了解的，——在这样一个事变刚一发生之后，馬克思立即发表一篇简短的諷刺作品，里面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全部历史过程的內在联系，把12月2日的奇迹解釋为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并且他这样解釋时除了对政变主人公表示完全应该的輕蔑之外，是用不着采取其他的态度的。馬克思把图画描繪得如此巧妙，使得后来每一次新的揭露，都只是提供出一些新的证据来证明这幅图画曾是把现实反映得极为真确的。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了解得如此卓越，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把事变的意义洞察得如此明白，这真是无可倫比的。

但要做到这个地步，曾需要有如馬克思那样深知法国历史的精湛知識。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历史上发生的阶级斗争每一次都比其他各国更加达到彻底的結局；而这种阶级斗争所借以

进展以及斗争结果所由以表现的变易更替的政治形式，也是在那里造成得更为确定。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国的模范，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制度而创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其所具有典型式的明显性实为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不及。而抬起头来的无产阶级反对那占有统治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现的尖锐形式，也是其他各国所未见过的。正因为如此，所以马克思不只特别偏好地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详细考察了法国当时的历史，搜集材料以备将来使用。所以，事变是从来也没有使他张皇失措的。

此外还有另一种情况。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进展法则，按照这个法则，一切历史上发生的斗争（不论它是在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领域中发生的，或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发生的），实际上只是各个社会阶级彼此斗争的多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则是由它们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来制约的。这个法则对于历史的意义，是与“能力转化律”对于自然科学的意义相同的，它在这里也是供马克思用以理解第二法兰西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本书里，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所发现的这个法则的正确性；虽然时间已过了三十三年，但我们还是必得承认这个试验获得了光辉的成就。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弗·恩格斯专为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1885年在汉堡出版的第三版而作

按照第三版本文刊印

原文是德文



---

## 目 录

卡·馬克思为本书第二版作的序言 .....	III-V
弗·恩格斯为本书第三版作的序言 .....	VI-VII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	1-103
一 .....	1
二 .....	12
三 .....	25
四 .....	41
五 .....	52
六 .....	71
七 .....	92
注釋 .....	109-116

##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sup>1</sup>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偉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現两次。他忘記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現，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現。科西迪耶尔代替丹东，路易·勃朗代替罗伯斯比尔，1848—1851年的山岳党代替1793—1795年的山岳党，侄儿代替伯父。在雾月十八日<sup>2</sup>事变再版的那些情况中，也可以看出一幅同样的漫画！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創造。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梦魇一样糾纏着活人的头脑。当人們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前所未聞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們战战兢兢地請出亡灵来給他們以帮助，借用它們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語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場面。例如，路德换上了使徒保羅的服装，1789—1814年的革命依次穿上了羅馬共和国和羅馬帝国的服装，而1848年的革命就只知道时而勉强模仿1789年，时而又模仿1793—1795年的革命傳統。就像一个剛学会外国語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語言譯成本国語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

外国語言翻成本國語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國語言来运用新語言的时候，他才算領会了新語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

在观察世界历史上这些召唤亡灵的行动时，立即就会看出它們中間的显著的差别。卡米尔·德穆兰、丹东、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拿破侖这些英雄人物，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羅馬的服装，讲着羅馬的語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即解除桎梏和建立現代資產階級社会。一些人粉碎了封建制度的基础，割去了长在这个基础上的封建头脑；另一个人在法國內部創造了一些条件，从而才保证有可能发展自由竞争，經營分成小块的地产，利用解除了桎梏的民族工业生产力，而他在法国境外則到处破坏各种封建的形式，为的是要給法国資產階級社会在欧洲大陆上創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适当环境。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連同一切复活的羅馬古董——所有这些布魯土斯、格拉古、普卜利科拉、护民官、元老以及凱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見了。冷靜务实的資產階級社会把薩伊、庫辛、魯瓦埃-科拉尔、本扎曼·孔斯旦和基佐当作自己真正的解釋者和代言人；它的真正統帥坐在营业所的办公桌后面，它的政治首領是肥头大耳的路易十八。資產階級社会完全埋头于財富的創造与和平竞争，竟忘記了古羅馬的幽灵曾經守护过它的搖籃。但是，不管資產階級社会怎样缺少英雄气概，它的誕生却是需要英雄行为、自我牺牲、恐怖、內战和民族战斗的。在羅馬共和国的高度严格的傳統中，資產階級社会的斗士們找到了为了不让自己看見自己的斗争的資產階級狹隘內容、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偉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例如，在一百年前，在另一发展阶段上，克倫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們的資產階級革命，就借用过旧約全書

中的語言、熱情和幻想。當真正的目的已經達到，當英國社會的資產階級改造已經實現時，洛克就排擠了哈巴谷<sup>①</sup>。

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鬥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舊的鬥爭；是為了提高想像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迴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起來。

在1848—1851年間，只有舊革命的幽靈在游蕩，從改穿了老巴伊的服裝的 *républicain en gants jaunes* [戴着柔皮手套的共和黨人] 馬拉斯特起，直到用已死的拿破侖的鐵面具把自己的鄙陋可厭的面貌掩蓋起來的冒險家止。自以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進運動的整個民族，忽然發現自己被拖回到一個早已死滅的時代；而為了要消除這方面的一切疑問，于是就使那些早已成為古董的舊的日期、舊的紀年、舊的名稱、舊的布告以及好像早已腐朽的舊憲兵復活起來。一個民族的感覺，就好像貝德勒姆<sup>3</sup> 那里的一個癡狂的英國人的感覺一樣，這個英國人把自己設想成古代法老的同代人，他每天悲痛地埋怨繁重的礦工勞動，因為他要在地下監獄般的埃塞俄比亞的金礦里辛苦勞動，借着系在他自己頭上的一盞暗淡油燈的燈光，在一些手持長鞭的奴隸監視人的監督下勞動；礦洞口站着一群亂哄哄的野蠻兵士，他們既不了解勞役囚人，相互之間也不了解，因為大家講着不同的語言。瘋癲的英國人嘆道：“我這個生來自由的不列顛人被迫忍受這一切，為的是要替古代法老找金子。”“為的是要替波拿巴家族還債，”——法蘭西民族嘆道。這個英國人在頭腦清醒的時候總不能撇開找金子這種頑固的念頭。

<sup>①</sup> 是聖經中的一個先知，見舊約全書“哈巴谷書”。——譯者注

法国人在从事于革命的时候，总不能摆脱对拿破仑的追念，12月10日的选举<sup>4</sup>就证明了这点。由于害怕革命的危險，他們曾經退回去追求埃及的肉鍋<sup>5</sup>，1851年12月2日事件便是对于这一点的报复。他們所得到的不只是一幅对老拿破仑的漫画，他們得到的是漫画化的老拿破仑本身，是在十九世紀中叶所应当出現的老拿破仑。

十九世紀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詩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从前的革命需要回忆过去的世界历史事件，为的是向自己隱瞞自己的內容。十九世紀的革命一定要让死者去埋葬他們自己的死者，为的是自己能弄清自己的內容。从前是辞藻胜于內容，现在是內容胜于辞藻。

二月革命对于旧社会是一个突然襲击，是一个意外事件，而人民則把这个突然的打击宣布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壮举，认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紀元。12月2日，二月革命被狡猾的騙子所葬送，結果，被消灭的不是君主制度本身，而是一世紀以来的斗争从君主制度方面夺取来的自由主义的让步。結果，不是社会本身获得了新的內容，而只是国家回到了最古的形态，回到了宝剑和袈裟的极端原始的統治。1851年12月的 coup de tête [輕率行为] 报复了1848年2月的 coup de main [勇敢打击]。来得容易，失去也容易。然而这两个事变之間的时间并不是白过了的。在1848—1851年期間，法国社会获得了(按革命的、因而是速成的方式)一些教訓和經驗，这些教訓和經驗在正常的即所謂按部就班地发展的进程中，本来应该在二月革命以前預先获得，以便使这次革命成为一个比較严重的事变，而不只是一种表面的动蕩。看起来仿佛社会現

在忽然落到它的出发点后面去了，实际上社会还只是在为自己創造革命所必需的出发点，創造为保证现代革命能具有严重性质所绝对必需的形势、关系和条件。

资产阶级的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

Hic Rhodus, hic salta!

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舞吧！<sup>6</sup>

但是，每个多少会观察的人，即使他没有逐步研究过法国事变发展的进程，也不免要预感到，这次革命必将遭受前所未有的屈辱。只要听一听民主派先生们当时那种自鸣得意的胜利叫嚣就够了，这些先生们曾经互相祝贺，满以为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sup>7</sup>一定会带来良好的结果。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在他们头脑中成了一种固定观念，成了一个教条，正如基督徒脑子里的基督再临和千年王国到来一样。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救，以为只要他能在自己的想像中驱除了敌人就算打败了敌人；他总是对自

己的未来以及自己打算建树、但现在还言之过早的功績信口吹嘘，因而失去对现实的一切感觉。这些英雄是想以彼此表示同情和結成一个特別集团，来駁倒关于他們显然庸碌无能的意見，他們收拾起自己的家私，預先拿起自己的桂冠，准备把他們的 *in partibus* [不存在的] 共和国（这些共和国的政府人員已由他們毫不挑剔地在暗中詮定了）拿到交易所里去貼現。12月2日像晴天霹靂一样震惊了他們。人民在意气消沉的时代总是乐意聆听叫得最响亮的呼喊者們的喊声来压抑自己內心的惊愕，这一次他們也許已經了解到：鵝叫声能够拯救卡皮托里的那种时代是已經过去了。

宪法、国民議会、保皇党派、藍色的和紅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鳴声、报刊的閃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名誉、民法和刑法、*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所有这一切，都好像一片幻影在一个人的咒文面前消失不見了，而这个人連他的敌人也不认为他是一个魔法师。普选权还保持了一刹那，好像仅仅是为着在全世界面前亲笔写下自己的遺囑，并以人民自己的名义宣布：“一切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一定要死亡。”<sup>8</sup>

像法国人那样說他們的民族遭受了偷襲，那是不够的。民族和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險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寬恕的。这样的言談並沒有揭穿哑謎，而只是把它換了一个說法罢了。还应当說明，为什么三千六百万人的民族竟会被三个衣冠楚楚的騙子弄得措手不及而毫无抵抗地作了俘虏呢。

現在我們来把法国革命从1848年2月24日到1851年12月所經過的阶段大致总结一下。

总共有以下三个明显的主要时期：二月时期；共和国建立时

期，或制宪国民議會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28日<sup>9</sup>）；宪制共和国时期，或立法国民議會时期（从1849年5月28日到1851年12月2日）。

第一个时期，从1848年2月24日到5月4日，即路易-菲力浦被推翻起到制宪議會开幕之日止（这是本来意义上的二月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革命的序幕。这个时期的性质，正式表现于这一时期仓卒建立的政府自己宣布自己是临时性的。在这个时期所采取、試行和发表的一切，都像政府一样，一概宣布自己只是临时性的。无论什么人和什么机构，都不敢承认自己有权长期存在，有权真正有所作为。所有一切准备了或决定了革命分子——王朝反对派<sup>10</sup>、共和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的小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民主派的工人，所有这些分子都在二月政府中临时取得了位置。

不这样也不可能。二月事变原先的目的只是要爭得选举制度的改革，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独占的統治。但是，当事变已演进到引起实际冲突，当人民已投入街垒斗争，当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等待的态度、军队不进行认真抵抗而王室已经逃走的时候，成立共和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每个政党都按自己的观点去解释共和国。手持武器夺得了共和国的无产阶级，在共和国上面盖上了自己的印記，并把它宣布为社会共和国。这样就拟定了现代革命的总的內容，这个內容和在当时的情况与条件下、在群众已达到的发展阶段上用現成材料所能立刻、直接实现的一切都是极为矛盾的。另一方面，其余一切曾經促进二月革命取得胜利分子，都因在政府里获得最好的位置而心滿意足了。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其他时期都没有当时那



样错综复杂；浮夸的空话同实际上的犹豫不决和束手无策相混杂，热烈谋求革新的努力同墨守陈规的顽固积习相混杂，整个社会表面上的协调同社会各个成分的严重的彼此背离相混杂。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在它眼前展开的伟大前途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过来，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

第二个时期——从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底——这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创立、奠定的时期。紧跟在二月事变之后，不仅王朝反对派被共和派弄得惊慌失措，共和派被社会主义者弄得惊慌失措，而且全法国都被巴黎弄得惊慌失措了。由全国选出而于1848年5月4日开幕的国民议会，是代表国家的。这个议会是对二月变变的奢望所提出的活的抗议，并且是要把革命的结果降低到资产阶级的水平。巴黎无产阶级一下子就看出了这个国民议会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国民议会开幕后不几天，即在5月15日，就曾经企图用强力停止其存在，把它解散，将民族反动精神所借以威胁他们的这个机体重新分解为各个构成部分，但是这个企图没有成功。大家知道，5月15日事变的结果，不过是使布朗基及其同道者，即无产阶级政党的真正领袖们，在我们所考察的整个周期中退出社会舞台罢了。

继路易-菲力浦的资产阶级君主制之后，只能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说，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巴黎无产阶级所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终止的狂妄妄想。对制宪国民议会的这个声明，巴黎无产阶级回答以六月起义，这是欧洲各国内战史